

[编者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时期有两条重要战线：一是军事战线，二是文化战线。我国读书、生活、新知三家杂志社在当时站在了进步文化的最前沿，它们也是文化抗战的重要出版机构和主流媒体，后合并为三联书店。其主要创始人分别为李公朴、艾思奇、邹韬奋、胡愈之、钱俊瑞、徐雪寒等人。在艰苦的岁月里，三联书店曾团结了几乎所有党内外进步作者，吸引了千千万万青年爱国者走上民族解放斗争，接着走向社会革命斗争的道路；同时，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准备和培养了一支经过锻炼的干部队伍。周恩来时刻关注这三家出版社的命运与发展，并经常给予切中要害与时弊的指导。今年，三联后人们在整理历史上作家队伍及其生平事迹时，一致认为高士其是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作家，因为他代表着科学文艺的一个方面与领域，是大众科普的创始人，并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高士其是文化抗战中的唯一科普作家。高士其之子高志其根据这一历史事实与脉络撰写了本文，叙述了高士其的科普创作与文化抗战的关系，并兼而回顾了高士其先生的一生。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100081)

The Editorial: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wide anti-fascist war, and als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ors. There existed 2 vitally important front lines during that period in China: 1. battle-front line. 2. culture-front line. The 3 magazines entitled Dushu, Xinzhi, and Shenghuo were always stand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progressive culture endeavors, they served as important publishing houses and mainstream media for inspiring the society through culture endeavors during that time. Later on, the aforementioned 3 magazines were merged into one, this is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Li Gongpu, Ai Siqi, Zhou Taofen, Hu Yuzhi, Qian Junrui, and Xu Xuehan, etc. were all its principal founders. During that arduous and tough period, the publishing house untied and inspired thousands of enlightened and insightful writers and young patriots around China to embark on a rosy and arduous road of seek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prepared and cultivated an array of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culture publishing endeavors in new China. Chinese late premier Zhou En' la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shing house where he did his utmost to offer wisdom and guidance for its development. Experts and scholars went into complete agreement that Gao Shiqi is an essentially important writer based on their detailed collections of writers and their biographies in modern China,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that Gao himself represents one specific area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lso father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riting in China. Additionally, he is

收稿日期：2015-06-18

作者简介：高志其，高士其之子，中国科普研究所高士其基金理事长，中国大文化学者、著名辞赋家，

Email: 2430269656 @ qq.com。

the only on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riter during that period. Gao Zhiqi, son of Gao Shiqi, contributes to this article based on Gao's life during that time, where Zhiqi expounds 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o'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riting and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ors by virtue of culture endeavors, and cherishes the memory of what Gao did for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out his life.

“Life, You Are a Divine Bird!” —— Cherish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Gao Shiqi

Gao Zhiqi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81)

这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1 起步于文学、科学与哲学的结合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由姥姥带大。1961年母亲金爱娣与父亲结婚后，我才于1964年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我对父亲的了解，除了听母亲讲述，主要来自阅读整理他的作品、他的日记和回忆录。

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作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

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祺”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2 第一个预见到细菌战与毒气战的爆发

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

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父亲首先注意到，抗日战争中，战士们的战壕中环境卫生很差，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而平日避免虱子骚扰，是值得注意的一着。父亲为此写了《战壕热》一诗，献给前线战士。他又应约陆续写了《微生物大观》、《细菌与人》、《防毒面具》等科普作品。在《我们的抗敌英雄》中，父亲将细菌比喻为日本侵略者，把白血球比作抗敌英雄，写得通俗易懂，又有鼓动性。李公朴、艾思奇交口称赞，说它具有鲁迅杂文式的风骨。

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打开父亲从1934年到1937年所创作的近百篇科普作品，我们发现抗战内容的题材占据了60%之多，正如父亲在晚年回忆时说道：“在这个时期内，我的病使我写作感到困难。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每天写1000字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配合着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拍节而写的。”

3 新中国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1937年“八一三”前夜，父亲写完了《菌儿自传》第十五章。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向父亲付了100多元，预支了《抗战与防疫》一书的版税，然后准备派社里的同仁护送父亲去延安。谁知道在苏州河上听了三天三夜的炮声还没有走成，最后父亲只身一人挤上了西行的列车离开了上海。后由于战事又耽搁在路上，旅费花光，于当年11月25日才抵达延安。当晚先期到延安的读书社的艾思奇就来看父亲，高兴地说：“好了，你也来了。”艾思奇领着父亲参观抗日军政大学，并会见了罗瑞卿校长。

在延安，父亲得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红色科学家”的称号，待遇等同于白求恩大夫。他担任了陕北公学的教师，经常被抬上讲台，向各级干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讲防疫与防毒知识，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国防科学在陕北》。陕北公学派了一位学生做父亲的秘书，不仅听父亲口若悬河地述说腹稿，作笔录，整理成文，而且每天晚上还帮父亲记他口述的日记。父亲常去艾思奇的窑洞，听他讲前线和大后方的消息。艾还告诉父亲，李公朴就要从山西太原来延安访问了。后来，父亲被搬到马列学院图书室外面的一个房间住，那里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父亲晒着太阳，读完了英文版的《静静的顿河》，他被深深吸引，爱不释手。有时，他与马列学院的学生们谈起他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的情景，学生们都听得很入神。延安遭轰炸后，父亲又被搬进窑洞中去住，他在此款待了读书社的老社长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公朴先生见延安如此器重科学人才，不胜感慨。

1939年的一天，父亲意外收到黄洛峰寄来的包裹，在一个方形的纸盒里，装着读书社新出版的父亲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和《细菌与人》各三本。父亲欣喜无比，将其中四本分送给爱读他书的友人。毛泽东回信说，他也“一读为快”。后来，由于延安缺医少药，父亲病情不见好转，1939年4月，又转道重庆，被护送去香港。

父亲抗战前在上海读书出版社就与汪伦（汪汉伦）夫妇相识，与他们夫妇二人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在延安又与他俩多次相聚。这次汪奉命先护送父亲到重庆。他是个身体强壮的安徽人，很健谈。父亲从延安带到重庆的一麻袋英文、俄文和德文版的书，包括毛泽东的两封信，拜托汪伦转交已到重庆的黄洛峰。父亲认为这些名著与书信是“无价之宝”，带到香港不安全。他特别相信黄洛峰能保护并利用好这批书。

在重庆“五四”大轰炸之后，父亲结识了一位国军司令，这位将军竟也很欣赏父亲写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特别是《疯狗与

贪牛的被控》一篇。这篇文章揭露了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发国难财的贪污罪行，引起将军的极大共鸣。1939年12月，父亲抵达香港。在这儿他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个爱人谢燕辉，生活上得到较细致的照顾。父亲脑子里酝酿成熟了两篇论文稿，由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新安旅行社的团员帮他记录。他的舌头不能动，发音低微，一般人听不懂；但那个团员耳聪目明，人又十分耐心，很善于猜测父亲的语音本意，有时不得已，父亲就用颤抖的手指在纸上涂几个字。遇到专门的名词，还要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后来，那位团员慢慢听惯了，合作越来越顺利。就这样，他俩每天写一上午，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古典自然哲学》，把它们交给了香港青年知识杂志社，主编阅后很是激动，认为它们是两篇“罕见的作品”。这两篇作品通俗地介绍了电子运动、原子运动、蛋白质运动、生命运动、行为运动等，在香港引起不小反响，因为抗战时期在中国，写这类作品的人实在非常少见。作品发表后，编辑部代父亲将它们分别寄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重庆的周恩来。

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茅盾当时也在香港，他以硕士的名衔，介绍了父亲分别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与《菌儿自传》两本科学小品集。父亲作品中的“小魔王”，指的就是各种危害人类的病菌。父亲像讲故事一样，用轻松的文体告诉读者这些毒菌如何传播、扩张，人们又该如何预防、消灭它们。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讲述如何对付最普通也最可怕的传染病的毒菌。这在抗战时是急需普及的卫生科学常识，又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族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

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患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我在编辑父亲全集时，深受这类真诚书评的感动，舍不得放弃，就把它一篇篇附在父亲有关作品的后面，以供后人阅读参考。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4 书友文友都是挚友战友

父亲在与病魔作斗争坚持写作的生活中，得到过无数爱国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无私关照。其中三联友人在战乱中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情谊更令人难忘。李公朴、黄洛峰、艾思奇、茅盾等人对他写作和出版的支持，前文已提及了。读书、生活、新知社的其他同仁的友爱也一言难尽。1937年，父亲在香港时，读书生活社有位叫童常的小伙子，与父亲在同一房间里住了几个月，不但帮父亲抄录稿子，还帮父亲到浴室洗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童常去台湾编辑《新生报》，一直做秘密工作。父亲非常怀念，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父亲由香港撤到桂林。有位从新知书店调到胡愈之领导的文化供应社工作的欧阳文彬，接受桂林地下党邵荃麟的指示，关照高士其的写作和生活。她工作的办公处是租借的，旁边正好有间空屋。邵让她向房东租下给我父亲住。欧阳阿姨念中学时就读过我父亲的书，也知道他的病况和艰难，十分敬仰和同情，她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欧阳当时才二十出头，据她后来回忆，父亲是坐着轮椅让人推进屋的。“脸上没有病容，双眼明亮有神，透露着智慧的光芒”，尽

管说话困难，但开朗乐观，还喜欢说笑话。他听说欧阳当时还兼着《科学知识》杂志的工作，就高兴地说他俩“是同行”，而欧阳是“生力军”，能住邻居“是缘分”。父亲不愿欧阳因为照顾他耽误自己的工作，每天只要求欧阳替他把手翻开，放在他面前。然后，欧阳就坐在他身旁编稿和校对。父亲看完一页，哼一声，欧阳就再替他翻到下一页。这样，不分心是不可能的。但欧阳说，父亲看得快，记得牢，思考深，对她真是一种“无形的策励”。欧阳的科学知识不够，在编校过程中如遇到不懂之处，可就近向高士其请教。于是，父亲就成了欧阳的顾问。彼此熟悉后，欧阳自愿当了顾问的助手。父亲构思好一篇科学小品新作，就请欧阳作笔录。他一次只能说一两个字，一个句子要断断续续分几次说出。父亲说得出了一身汗，欧阳记得也出了一身汗。父亲总是满怀歉意地问她：“累坏了吧？”她总是摇摇头说：“值得，值得。”不久，照顾父亲的护士来了，欧阳阿姨也调到重庆工作了。她后来写了本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并成了一位文艺评论家。他俩再重逢，竟是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参加文代会，父亲一眼就认出了欧阳，马上重提四十年前在桂林二人为邻的往事。

我在编《高士其全集》时，曾向欧阳阿姨约稿，她觉得记忆太零碎，未及成文，其实，就是这些零星的记忆场景，深深打动着读者！现在，老三联人中，能作如此细微追忆的健在者，只有95岁高龄的欧阳阿姨了，我赶快告诉高士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高士其小组，赶往上海，抢救下了这份珍贵的口述。虽然，当年父亲在上海静安寺斜桥弄读书生活出版社写作的旧址已荡然无存，但能做这件口述补救，也令我很觉欣慰了！

5 筹建食品科学研究所支援滇缅抗战

1944年1月正值抗战的紧张时期，父亲转移到桂林，地下党员邵荃麟、孟用潜邀请高士其筹建远东盟军食品研究所并任所长，盟军方面审核了父亲的履历后，批准了这一任命。于是父亲亲自画图设计蒸馏器，采购了灭菌

锅及绞肉机，研究开发了各类战时食品，并组织建造厂房，工厂生产了花生酱、肉罐头、枇杷露、蜜枣糖、啤酒等。食品科学研究所还接待了外宾参观，盟军派了有关的专家与军官前来考察，父亲亲自接待并讲解，尽管他的中文发音很困难，但英文谈话却流畅无阻（因为这是发音方式的不同）。专家和军官们看了产品与设备后非常满意。此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类罐头供应盟军部队与抗战将士，有力地支援了滇缅战争。

父亲也因此列入了文化名人抗战贡献册（相关资料见台北图书馆）。

1944年10月日本鬼子开始向桂林大举进攻，位于丽君路食品科学研究所也毁于炮火之中，化为了灰烬，食品科学研究所所在战火中解散了。

父亲拖着严重的病躯，亦考虑准备撤退。

6 穿行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现实之间

桂林紧急疏散阶段，父亲的安全成了问题，但他仍在家研究《周易》，他曾给万分惊讶的柳亚子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说他“从八卦中发现了科学字母”，并详细介绍了其成果的内涵和原理，把柳先生的兴趣也给调了起来，他很诧异，一个现代科学家居然和古老的《易经》结合起来。说起父亲手中那两本《周易》，还是祖传版本的世袭文化遗书呢，它竟然在战乱中几经周折被父亲保护得完好无损，虽然外貌变得又黄又旧，却更像是古色古香的珍品。《周易》是周文王的经书，其中有两句话最令父亲激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许，“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就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吧！父亲对奥妙无穷的八卦圈圈曾着迷地画了又画，至今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文稿中还留有遗迹。桂林沦陷前后，是父亲最悲惨狼狈的逃亡日子，他的随身皮箱中，仅放得下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概论》，再有，就是这两本《周易》。

父亲虽然像机器一样需要人帮忙搬来搬去，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用他清醒的大脑工

作。他热烈地爱着人生。有时，他会跳出科学研究，作普通人的呐喊；有时也异常冷静地进行着逻辑思维。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桂东的八步镇被护送到广州的兄弟图书公司，它是新知书店的另一个牌子，第一位接待他的是兄弟图书公司的经理曹健飞。父亲被安置下后，为何家槐翻译的伊林著《跃进三百年》写了一篇序言，1946年夏天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后来，他又请何家槐的夫人帮他笔录自己口述的抒情诗《长期的忍耐》。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父亲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如《给流血的朋友们》、《黑暗与光明》、《悼四烈士》、《言论自由》、《我的质问》、《黎明》等。在《平等》一诗中，父亲写道：“在电子的世界里／宇宙是平等的／在原子世界里／物质是平等的／在细胞的世界里／生物是平等的／在民主的世界里／人民是平等的……”诗歌短，容易想，容易写，也容易抄。从父亲写的这些诗，可以看出，他已十分注重思维科学。在这不安定的年头，他写的小品只有一篇《劳动人民的生理学——民主的纤毛细胞》。当时他整日满脑想着劳动人民和民主，是以大脑细胞回忆的方式来叙述的。论文《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古典自然哲学》发表后，他由此演变出来的长篇科学诗《天的进行曲》，辩证地讲了天、地、人的对立统一关系。1945年底，广州的国民党特务结队冲到兄弟图书公司，捣毁书籍、报刊及其他物件，父亲事后目睹横七竖八的纷乱现场，气愤不已。写了首政治诗，叫《我的原子也在爆炸》，呐喊：“竖起民主的旗帜／打起反内战的战鼓。”

1946年6月，父亲由广州被护送到上海后终于彻底病倒。他无钱住院、买药、吃饭。上海地下党为此发起救助捐赠活动。《文汇报》、《世界报》发表了对父亲的介绍，众多市民、青年前来送钱、送书、送药、送点心。那些鲜花和来信，天天温暖着细菌学家高士其那颗柔软的心。他写了《回敬崇高的慰问》一诗致谢。7月，为公祭挚友李公朴、陶行知、闻一多，父亲发表了悲壮的诗篇《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并亲赴“李、闻、陶公祭大

会”，不能站立的他在人的搀扶下站立了很久。

那年秋天，父亲病情有了好转，读书社的领导黄洛峰为父亲开了封介绍信，由社里学者郑易里等陪父亲去周公馆见了邓颖超，表达他想去解放区的愿望。但交通不便，父亲最后被秘密交给读书社的黄洛峰、华昌泗和群益出版社的总编（实际是党内文化领导人）冯乃超，安排照顾他渡难关。国母宋庆龄也从“保卫中国大同盟基金”内，拨了一笔款接济父亲。

爱国友人们将他送到苏州一座古老民房秘密疗养。为了躲避白区密布的宪警特的监视，父亲第一次穿上黄军服，假借国民党演剧队病员的名义，住在这里继续写作。两位演剧队员照顾着他，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党外围组织成员。三十年后，其中一位写给父亲的信中，生动描绘了父亲锻炼和写作的那种“奋发不倦”形象，说他们逐步学会了怎样捕捉父亲“长的音调里一个个珍珠似的字，才更体会它吐出的昂贵”。他们被父亲深深震动，禁不住问：“这样的著述方法，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吗？”

7 为自己的使命作最后的人生搏击

后来，父亲被护送到台北治疗两年。1949年5月，他乘“湖北轮”由香港转道天津去北平。送行人仍是书店地下党老相识邵荃麟和曹健飞。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和国歌声中，往事与历史一幕幕在父亲脑中闪现。他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历史还会这样前进着，就像时空的广大与无际。／从这里，我开始了新的把科学交给人民的事业。”父亲在此之后，继续为真理、为“把科学交给人民”的历史使命奉献着自己。令人吃惊的是，从1949年到1977年，他又极艰难地写了1500多篇短文和诗歌。这真是一个奇迹！由于他的科学引领，全国青少年亲切地称他为“高士其爷爷”。

1977年底，一场严重的疾病剥夺了父亲的口述能力，等于剥夺了他唯一的写作方式。但从从不向命运屈服的父亲，毅然拿起笔锻炼写字，从每天几十字竟然写到两千字！1983年，当他不能自己吞咽食物，便意识到自己的时间

不多了,他竭尽最后的气力,想拨亮生命的火焰,为后人多照亮一段人生之路……从此,他一天到晚握着笔,不停地写他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笔记本。直到1985年1月北京医院南楼定向爆破,大量的尘埃导致父亲患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从此三年卧床不起。终止写作那天,父亲恰恰写到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虽然,父亲回忆录在那里画上了终结号,但他已经写出了自己一生最传奇的际遇,真实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高士其,敞开了一个诗人和科学家的心灵,一颗循着文化、哲学与宗教之谛的内在走向的心灵,一颗热爱全人类的博大心灵。回忆录的内容空间跨度,从宗教、文化、哲学、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社会科学的政治、人文科学的艺术、思维科学的形态,俱皆包罗。回忆事件的时间跨度,从满清末年、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一一囊括。在父亲回忆笔录中,虽然留下了无数颤抖的划痕,但他却写出了时空的交替与回溯,宛若电影的倒叙与穿插。常人难以想象,这一切都是一个六十年前被医生判过只有五年生命期的残疾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完成的。任何人见到它们,都会震撼和感泣!

父亲的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有一百多种版本,被译成多种文字。他为人类的安康与科学传播孜孜不倦地劳瘁奋斗了六十多年,在他八十三岁时,离开了他挚爱的人间。中央组织部根据高士其一生的表现,在悼词中称他为“中华民族英雄”。

父亲去世后,我受他精神的感召,在中国科协支持下,将他一生心血的结晶编了一套近二百万字五卷本的《高士其全集》,荣获了国

家最高图书奖等四项大奖。1997年,为继承父亲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科普教育的事业,我又在福建省政府支持下,参与筹建“高士其故居”以及江苏苏州“高士其科普基地”。父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1999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国际编号为3704号的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最近十年,我将父亲几十本写得凌乱模糊的回忆录,反复地辨认、增删、整理,今年《高士其自传》终于在他诞辰110周年之际得以出版。

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觉得他宛若一位天使,传播着科学与和平的福音,背负着世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与病痛,以科学人文的大爱而博得世界的尊重与景仰。他身上体现着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与对现实苦难救赎的精神,正如他人生三个阶段所恪守的格言与誓愿中体现的那样。父亲的幼年崇尚祖传《易经》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待至而立之年,他毅然提出:“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而于晚年他又说道:“我能做的是有限的,我想做的是无穷的。有生之年一息尚存,我当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

在父亲去世后,我虽身患白血病,但受父亲与命运抗争的鼓舞,学习他以发展的眼光看社会和自然,悉心研究天、地、人的关系。我主张“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古今圣贤相往来/与宇宙规律相往来/与时空真谛相往来”,并到联合国与祖国各地宣讲和合文明、和合文化,希望世界走向和平、和谐与和合。

父亲,您的生命精神真的就是一只神鸟。它飞翔在宇宙间,飞翔在广大读者中,也将永远飞翔在我的心中!

(编辑 张南茜)